

# 河上肇讲义：从历史学派到马克思<sup>\*</sup>

刘群艺 相泽宇

**摘要：**作为中日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关键人物，河上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试图利用京都大学公开的河上肇讲义来补叙这一关键人物的思想史历程，即从历史学派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转化，也借此透视 20 世纪上半期中日两国经济学形成阶段的人物、学派与时代精神特征。河上肇基于德川国家学思想的启蒙，借宗教信仰叩问社会问题，并将二者融合于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传统中，又在教学与启迪民众的实践中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追溯这一思想历程也有助于理解河上肇的第二次转向，这前后两次转向都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学者对时代风潮的关注、追随以及随之改变的可能性。

**关键词：**河上肇 历史学派 马克思主义 经济思想史

在日本京都大学校史馆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落，这是复原的 1930 年前后一位经济学部新生的寄宿宿舍，是根据 1932 年《京都帝国大学学生计调查报告》及当时理学部教授田村雄一《漫画日记》进行的场景复原。这些资料显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思潮，而其倡导者河上肇（1879—1946）则是最受学生尊敬的指导者。在这个寄宿生的小小木制书架上，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赫然在列。但其实，早在这个学生入学之前的 1928 年，河上肇就已经被迫辞职了。京都大学校史馆就以这样的方式给曾任经济学教授的河上肇留下了一个供后人瞻仰的位置。

纪念的方式不止校史馆中的这一场景。1969 年，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创立 50 周年之际，学部附属的经济资料研究中心将河上肇的藏书辑为文库。除了河上肇的藏书之外，文库中还有讲义、手稿和书信等。其中的讲义基本囊括

[作者简介] 刘群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lqunyi@hotmail.com；相泽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xiangzeyu@pku.edu.c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东亚区域内的经济思想传播研究”（批准号：18BJL011）阶段性成果。衷心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了河上在京都大学任教 20 年间所有课程的资料，而手稿则包括河上的代表作《资本论入门》和《第二贫乏物语》等。2008 年，京都大学又将文库中的讲义和手稿全部电子化，为河上的仰慕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近距离了解河上的渠道。

如果说京都大学的纪念方式有对当时被迫辞职的河上教授的歉意在里面，那么迄今为止对他的研究就远远超出京都大学的范围了。在日本，除了京都以外，河上的出生地山口县，以及他求学的东京都有自发的研究会，分别为京都河上肇纪念会、山口河上会与东京河上会。这些研究会基本每年都会召开会议，并出版会刊。在重要的纪念年份，还会组织大型演讲会和展览会等活动。在河上肇诞辰 120 周年之际，京都河上肇纪念会也曾召集学者对河上肇在日本国内外的影响力以及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加藤周一等，2000）。欧美学界有专门研究河上肇的著作（Bernstein，1976）。在东亚，韩国有被称为“韩国河上肇”的其韩国弟子李顺铎（1897—?），也有关于河上肇对韩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影响的研究（박종린，2009，2012，2014）。而我国对于河上肇的直接译介以及研究则从民国时期就开始了，迄今仍然在进行中。三田刚史曾做过河上肇著作汉译本的列表（三田刚史，2003）。我国学者还是主要从传播史角度来探究河上肇在马克思主义日本路径中所起的作用，包括对河上肇本人思想的评述（宗山，1991；贾纯，1992；程恩富，2006：60—66；李虹，2013；谈敏，2016：1101—1105），以及对相关人物受到河上肇影响的研究（韩一德、李帆，1992；安雅琴，2016；李斌，2017）。其中有的学者阐释了河上肇的思想转变，但更关注其中的哲学含义（宗山，1991）。

河上肇在经济思想史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贡献，还在于他的前后转向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史含义。众所周知，河上肇的第二次转向，即承诺不再参与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时代象征意义（杨栋梁，2022）；但之前一次转向，即从历史学派转向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得到国内学人的太多关注。实际上，只有理解了河上肇的第一次转向，才能明晰其第二次转向的原因，而其第一次转向就是在京都大学任教期间完成的。因此，京都大学提供的河上肇讲义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

本文利用京都大学河上肇文库中的经济学讲义及专著等资料，并结合中外河上肇研究的二手资料，来剖析河上肇的这一思想历程。下文先梳理河上肇自江户国家学与历史学派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点出京都大学时期的转折性意义；再详述河上肇在京都大学任教期间的思想转变过程，突出教学相长及转变的每一环

节与民众的互动性；然后集中于河上肇的经济学著作与讲义，从这些专业资料入手来印证其转向的思想特征；最后是结语，概述河上肇第一次转向的东亚含义。

## 一、河上肇的思想轨迹

正如前述，河上肇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开创地位，还因为他在人生不同阶段曾经经历思想导向的转变。1933年，河上肇赋诗，描述自己的坎坷一生（一海知義，1979）：

年少夙欣慕松阴，  
后学马克斯礼忍。  
读书万卷竟何事，  
老来徒为狱里人。

从上述诗句可以看出，河上肇先受到维新思想的感召，后来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始终以读书为本业，年老却身陷囹圄，失去自由。

其中的“松阴”是指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1830—1859）。河上肇在高中预科求学期间，正逢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一书出版，河上读后大受启发。他自述，自己作为经世家的理想，就是受到松阴精神的极大鼓舞。他还曾经仿照松阴的名字取过“梅阴生”的别号（河上肇，1964a：55—56）。也因为这个原因，在高中毕业前夕，河上肇不顾常理，将自己的大学专业从文科转为法律。

河上肇在自传里对自己的大学生活较少提及，只对其中听各种演讲的经历有些描述：“最使我〔河上肇〕感到兴趣的是木下尚江和内村鉴三两位的演讲。他们的演讲给予我思想上的影响，远远超过大学教授的讲课。我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等的关心，完全是由此而来。”（河上肇，1964b：391）

1902年7月，河上肇大学毕业。他本来想做记者，但求职屡屡不顺。后在研究生导师的推荐下，河上得到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非常勤讲师职位，并担任当时由帝大教授发起的《国家学会杂志》的编辑委员，他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他的研究生专业为近世经济政策史，主要关注德川时代的经济思想，这也是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肇始。

早期佛教徒家庭背景、经世思想，以及后来阅读《圣经》等经历，使得

河上肇对于宗教有不同寻常的信仰。无论是他对于德川时期经济思想的解读，还是后来误入“无我苑”等宗教组织，他都在试图将宗教真理与科学真理进行融合，以实现个人至真至纯的理想。他自述：“前几年，我〔河上肇〕毕业于法科大学，现在还在大学院学习，一方面担任着四五个学校的教师，讲授经济学。近几年来，我很想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些贡献，所以一直想根据自己所学的东西，研究出一个‘为善易而作恶难’的社会组织。”（河上肇，1964b：401）

如果说宗教对河上肇的影响力在于人生观的确立，那么当时较为盛行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历史学派，对于河上肇来说，就是实现理想的有效手段了。这种手段具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会综合不同的学派，一切以解决现实问题为选择标准。在解读三浦梅园（1723—1789）的经济思想时，河上肇接受了德川时期经济学——国家学的理念，以国民经济体系为分析出发点，从货币论的角度来理解三浦，认为三浦以消除贫困为目的，主张增加金银的保有量。但另一方面，河上肇又将三浦的生平及代表作的发表年份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做对比，将三浦称为“日本经济的鼻祖”，认为三浦从个人经济着眼，以货币为媒介，联结农工商三业，获得国富，与斯密有很多重合之处（三田刚史，2003：64—66）。

在投身无产阶级实践之前，河上肇通过不断写作来进行思想的磨合。从1905年出版《经济学原论》到1923年出版《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河上肇为自己的西洋古典经济学探索留下了以利己主义为主线的思想脉络，也为日本经济学史研究划定了从简单拿到融主观于分析中的分界线。

与上述思想轨迹类似，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也绝非一蹴而就。他自述：“我最初翻译塞利格曼那本讨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著作《历史的经济的说明》，把它改题作《新史观》出版，是1905年、我虚岁二十七那年的事。后来好不容易对唯物史观获得正确的理解时，我的年纪已经五十出头了，所以这中间几乎耗费了二十多年功夫，也就是整个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壮年时代。”（河上肇，1964a：102）

因此，与之前的观点有所不同，河上肇并非在赴欧洲短期留学之后才开始这种转向的（莫里斯-铃木，2000：87），更非迟至十月革命才开始相关研究的（宗山，1991；孙怀仁、雍文远，1994：732），而是在此之前就在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完成了多篇相关论述（深澤竜人，2019），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转变过程（虞丹，2001：18—19）。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是出自一个学者、一个经济思想史学者，特别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经济思想史学者的自然反应，目的在于

了解和研究对当时日本社会极具影响力的一种外来思潮。但在 1919 年之后，河上肇开始逐渐从研究者转为信仰者，这种转向是他在京都大学任教过程中展开的。

河上肇曾在自传里引用一位匿名杂志作者对自己的评论，认为对这篇文章心有戚戚焉：

《社会问题研究》以后，他〔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色彩逐渐浓厚起来。像熬牛皮糖一样，一点一点浓厚起来，这是河上肇的思想的特点，在日本思想家里面再找不出第二个。在日本，多的是那种暴发户思想家，他们看到法西斯主义流行了，马上就想写本法西斯的书；而像河上肇那样，在看出一个究竟之前，始终不声不响地啃着一种思想慢慢地发生变化的人，却非常少。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学说比较地受到人们的信任，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拥护他（河上肇，1964a：94—95）。

对于后半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河上肇是这样独白的：

1905 年底，我曾经一度打算完全放弃经济学的学习，连历年从有限的家庭生活费中东拼西凑买来的一点经济学书籍，也都被我全部卖掉，一本没留。可是，后来又重新搞起经济学来；到 1908 年，又依靠素不相识的户田海市博士的推荐，到京都帝国大学教起书来。我从而有机会安安静静地埋头于经济学研究，约二十年之久，终于把自己造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可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过程中，我也没有固定的老师，因而走了许多弯路，长时期中感到无所适从，到了能够谈谈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未能轻易地摆脱似是而非的阶段；直到 1928 年辞掉了大学教授之后，才算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河上肇，1964b：418）。

因此，1908 年至 1928 年的京都大学教书匠生涯对于河上肇来说，是决定其一生命运的最关键的时期。

## 二、京都大学时代的河上肇

京都大学年表中并没有河上肇入职的信息。1908 年，与河上肇同时入职

的有 54 名教授，河上肇的名字就在年表中被省略了。但在 1928 年，京都大学为河上肇足足留下了 9 笔记录，详细列明了河上肇被迫辞职的过程，并称其为“河上事件”：

1928 年 4 月 16 日上午，经济学部教授会议。不同意校长关于河上肇辞职的要求，但还是通过决议，同意请河上肇辞职。下午，荒木校长劝告河上辞职。河上拒绝了校长的要求，但归宅后听闻经济学部教授会的决议，表明辞意。

4 月 17 日河上肇提出辞职书。

4 月 18 日下达依本人愿望免去公职的命令。

4 月 17 日学生准备集会，对河上教授的辞职进行抗议，遭到学生监管部门的禁止。

4 月 18 日荒木校长解散社会科学研究会。

4 月 18 日经济学部学生发表抗议河上辞职的声明。

4 月 20 日召开学生大会，统一关于河上教授辞职问题的学生意见。“表现出学生的本意”，不能召开。

4 月 21 日河上在《京都帝国大学新闻》上发表《离开大学之际》一文。

5 月 12 日学生自愿组织河上博士谢恩会，在乐友会馆举行。学生发表反对河上博士辞职的声明书（京都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2001：792—793）。

一年以后河上肇的影响犹存。当时有位庆应大学的教授在京都大学演讲，主题为“马克思资本论学说与俄国革命”，其中涉及对河上肇的批评。这一演讲遭到京都大学学生的抗议，可见河上并非人走茶凉。

河上肇在自传的“教师自画像”中曾经有些腼腆地写道：“说实话，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够得上算个好教师。”（河上肇，1964b：372）从以上辞职经历中可以看出，这句话并非虚言。

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原属于法科大学的一部分，先是以经济学讲座的形式存在于法科之中。学科最初的研究对象是以大阪为中心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而设置的课程体系也以交通、工商业和农业等具体部门研究为主。

1914年，法科大学的政治学科改称政治经济学科，增加了“经济原论”、“殖民政策”和“外国法律”等必修课，以及“经济史”和“经济学史”等选修课，但课程主体还是以产业经济、货币银行、财政学、行业统计学等实用性课程为主。1919年，跟随“帝国大学令”中东京帝国大学的学部变动，京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科分为政治学部和经济学部，经济学专业独立（京都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1997：378—384）。

正如上文所述，河上肇1908年8月入职京都大学，属于创设期的八大教授之一。此外，经济学部的独立也有河上肇的功劳。他曾与校长一起赴东京，向文部省提交陈情书，主张把经济学部从法科大学独立出来，单独成系。独立成系也是教授治校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当校长要求河上辞职时，河上并没有同意，但听说是教授会议的决议时，他就欣然接受了（河上肇，1964b：361—363）。

刚独立出来的经济学部仍然表现出原来附属于法科大学的特征，在课程中设立了大量法律课程，并且仍将政治学和殖民政策作为科目选择（见表1）。除此之外，其他课程设置与美国大学的课程体系有些类似，即在基础课之外，重视史学类课程与名著选读，再分产业部门进行讲授。另外，呼应当时日本社会与知识界的诉求，设立“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课程。

表1 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课程设置（1919年）

学年	类别	科目
第一学年	必修	经济原论第一部、经济史、殖民政策、统计学、宪法、行政法、民法第一部、经济著作讲读(第一外国语)
	选修	哲学、社会学、政治史、刑法总论、经济著作讲读(第二外国语)
第二学年	必修	经济原论第二部、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外国贸易论、社会问题及社会政策第一部、财政学第一部、民法第二部、经济著作讲读(第一外国语)
	选修	日本经济史、政治学、国际公法第一部、国际公法第二部、经济著作讲读(第二外国语)
第三学年	必修	经济学史、金融论、交通论、保险论、社会问题及社会政策第二部、财政学第二部、商法、经济著作讲读(第一外国语)
	选修	东洋经济学史、经济地理、会计学、国际私法、经济著作讲读(第二外国语)

资料来源：京都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1997：378—384）。

说明：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表中文字尽量使用原文词语。

作为创系元老，河上肇讲授的也是经济学的基础课程。在出国留学之前，他主要承担经济史、经济学史和政治学课程。归国之后，他与同事更替讲授经济原论与经济学史课程，每年交换。这是学部的特意安排，称为“竞争讲义”。另外，他还讲授经济著作讲读、社会问题及社会政策等课程。到1928年辞职为止，河上肇共讲授过6次经济原论，并针对分配论开过3次特殊课程。他还在京都大学开创了日本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传统，并以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为脉络整理了西洋古典经济思想史。可以说，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课程或者直接源于河上的讲义，或者与他众多的学生密切相关。虽然如此，河上肇并非遵循单一的学科传统，而是跟随日本经济学的演变历程，将历史主义、边际学派、美国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等经济学理论都融入课程讲义、教材与学术著作之中，呈现出一幅20世纪初多元化的日本经济学发展史图景。

在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留存有河上肇拟定的考试题目（见表2）。从题目中可以看出，他至少从1911年开始就在课程中讲授唯物史观，并且在课程中注意使用日本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资料。因此，可以说河上肇在去欧洲留学之前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了。这在他指导过的近卫文麿（1891—1945）的回忆中也有体现：“当时的河上，已经在研究马克思，经常对我们说‘必须能读通马克思的著作，否则就不行’，却并不极端左倾。……那时他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斯巴戈尔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一本是意大利都灵大学教授罗利亚著的《现代社会问题》。关于后者，交给我的时候他还说：‘这本书非常有趣，读了就放不下手，我一夜就把它读完了。’记得当时我也兴奋地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想来，那时河上也许还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实际运动还没有发生关系。不过嘴里老讲‘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应当经常做好被驱逐出国的精神准备’。在京都的时候，差不多有一年功夫经常到他家里去，后来他被派到欧洲留学去了。”（河上肇，1964a：128）

表2 河上肇的试题

时间	科目	试题
1910年9月— 1911年6月	经济史	1. 什么是经济史观？请就其弱点进行评论。 2. 机械的发达对劳动阶级的影响是什么？ 3. 简答下列问题：(1)劳动歌的起因是什么？(2)畜牧的起源是什么？(3)Manor是什么？(4)Craft gild是什么？

续表

时间	科目	试题
1911年9月— 1912年6月	经济史	<p>1. 历史有法则吗？      2. 请评论一下唯物史观。      3. 人类与非人类的动物在经济上的差异是什么？      4. 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请在以上四题中选二题回答。</p>
1912年9月— 1913年5月	经济史	1874年以后20年间世界金本位国物价下降的主要原因以及同时期日本物价腾贵的主要原因。
1913年6月	经济史	<p>1. 明治十年以后我国物价急速上升的主要原因以及煤炭价格下降的原因，明治十四年四月一円银币兑换一円八十钱，那么当时的价值本位是如何变化的。      2. 世界金本位国物价趋势在1896—1897年的变动主因是什么，我国物价变动与此趋势不同的原因是什么。</p>
1913年6月	经济学史	<p>1. 亚当·斯密如何对价值进行分类，对价值与劳动的关系如何评价。      2. 李嘉图对价值与劳动的关系如何评价。      3. 你所了解的三浦梅园的价原理论。      4.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初版概要以及再版之后的主要变化。      5. 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主要反对意见。      6. 我国德川时期的学者对人口增加有什么看法。</p>

资料来源：細川元雄（1979）。

说明：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表中文字尽量使用原文词语。

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京都大学的学生以及同僚对河上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河上肇的畏友栉田民藏（1885—1934）就是河上在京都大学的第一届学生。栉田前前后后写了多篇批评河上肇的文章，甚至栉田文集的编者就将其批评河上肇作为栉田写作的一个脉络（河上肇，1964a：135—136）。例如，在河上肇出版《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一书之后，栉田民藏发表长篇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还是黑暗——关于河上博士所著〈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的一点感想》，对其进行批驳，认为河上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误。其实河上本意并非栉田所述，但也虚心接受：“我读了

栉田这篇论文，觉得有几处虽则是缺乏善意的曲解，可是大体上说来，他说得很对，确实击中了我的要害。我一方面痛感到吃了一次败仗，另一方面决心发奋努力，重新从头搞起，说什么也得掌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真髓。那时这种决心，正是使我后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真能有几分理解的基本动力。”（河上肇，1964a：113）

根据河上肇的学生恒藤恭的回忆，在经济学部独立之后，法学部的学生约20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劳学会”，请时任经济学部教授的河上肇来给他们讲解《共产党宣言》。这个“劳学会”就是“社会问题研究会”的前身，栉田民藏也是成员之一（細川元雄，1979）。

标志着河上转向的《社会问题研究》刊物，也得益于他的京都大学同事小岛祐马（1881—1966）和栉田民藏的督促：“是我〔河上肇〕的朋友小岛祐马和栉田民藏背着我先和京都弘文堂书店的老板商量好，然后通知我，要我执笔，匆匆忙忙地从1919年1月开始搞起来的。”（河上肇，1964a：130）

此外，河上肇也是京都大学经济学读书会的积极参与者。这个读书会的成员以法科大学和文科大学的教师为主体，也有外校教师和实业界人士来参与。读书会从1912年11月开始，到1915年5月为止，共举行过19回。河上肇除去赴欧洲留学期间缺席之外，每次必出席，并且主讲了3次，主题分别为：信用膨胀导致的物价腾贵（第7回，1913年5月4日）、对费雪货币数量说的批评（第9回，1913年6月8日）、人种问题（第19回，1915年5月16日）（細川元雄，1979）。这些主题体现出河上肇研究关注点的转移。

从河上肇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教学相长的力量。河上肇本身是一位尽心尽责的教师，全身心投入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这种投入也得到了学生的积极回应。作为教师的河上肇，借此也完成了自我教育。他自述：“我〔河上肇〕最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多年来寻求安身立命的真理，一步一步地靠拢马克思，到了最后，终于转化为和最初的出发点正相反的东西。为了完成这样的转化，我在京都帝国大学费了二十年的岁月。这件事虽则不外乎证明我的愚钝，却也足以驳倒一部分人指摘我现在的立场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的无批判的盲从的说法吧。回头看一下我的彻底转向马克思学说，乃是长期采取几乎值得唾弃的踌躇折中态度以后，方才实现的。不过，正由于我经历了长期研究思索才好不容易达到今天这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今天即使把我抛进火里去烧炙，我在学问上的信仰也决不会动摇的。”（河上肇，

1964a: 110) 因此，“如果把我〔河上肇〕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全部拿出来，再把大约二十年间我在京都帝国大学每年的讲稿完全收集起来，根据它们来考察我过去的思想变化的经过，也许能更正确而详细地弄清楚其中的迂回曲折的过程吧”(河上肇, 1964a: 96)。

下文就结合河上肇的讲义来分析他先后出版的两部经济学教材——《经济学原论》与《经济学大纲》，进一步分析河上肇从历史学派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

### 三、从《经济学原论》到《经济学大纲》

河上肇先后出版过多部经济学概论教材，分别是《经济学原论》(东京：有斐阁，1905年)、《经济学研究》(东京：博文馆，1912年)、《经济原论》(东京：有斐阁，1913年)和《经济学大纲》(东京：改造社，1928年)。其中第一部在他于东京任教时出版，最后一部则是他在京都大学辞职以后面世的。虽然都为作者的讲义，但内容却截然不同(参见表3)。

1905年1月，河上肇在大学毕业不足两年之时，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经济学上之根本观念》(河上肇, 1905)。从这本书的目录来看，河上模仿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前辈金井延的历史主义学派观点，内容包括经济中的欲望、财物、经济行为、满足欲望的行为、经济，以及国民经济等。“财物”一章显示出河上肇研究德川经济思想的经历，他仿照佐藤信渊(1769—1850)《经济要略》的“开物”一章，将“天下的财物”区分为“原始产物”和“制造物”，把前者又分为“植物的原始产物”、“动物的原始产物”和“非生物的原始产物”等三类，而后者则分为“被服类”、“饮食物类”、“建筑物及机械、道具、器具、用品类”、“助成品”和“货币”等五类(三田刚史, 2003: 68—70)。

上述小书就像是一个简短的预告片。同年，河上肇就推出了自己的大部头教材，这就是《经济学原论》。按照书的目录(见表3)，作者原意分为上下中三卷，但其实只完成了上卷，因为此后河上受到心灵的感召，暂时放下了经济学研究。但即使是未完本，这本书也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在1907年就再版了。

表 3 河上肇《经济学原论》与《经济学大纲》目录

《经济学原论》	《经济学大纲》上卷
目次	
上卷	
第一编 序论	前言
第一章 经济上的欲望	目录
第一节 欲望的观念	序说
第二节 欲望的种类	第一节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出发点
第三节 经济上的欲望的观念	第二节 研究方法
第四节 经济上的欲望的种类及其发展	第一篇 商品及货币
第五节 经济主体(经济上的人)	第一章 商品
第二章 财物	第一节 当作商品的构成分子的使用价值及价值
第一节 财的观念	第二节 价值形态(当作价值的现象形态的交换价值)
第二节 财的种类	一 简单的价值形态
第三节 财物的观念	二 扩大了的价值形态
第四节 财物的种类	三 一般的价值形态
第五节 财物的效用及其价值	四 货币形态
第六节 财产的观念及其种类	第三节 诸商品的交换进程
第三章 经济行为	第二章 货币
第一节 经济行为的观念	第一节 价值的尺标
第二节 经济行为的成立要素	第二节 流通手段
第三节 经济行为的分类	第三节 当作价值物本身的货币
第四节 经济行为的发展	一 储财手段
第四章 经济	二 支付手段
第一节 经济的观念	三 世界货币
第二节 经济的种类	第二篇 资本的生产进程
第三节 经济的发展	第三章 货币变形为资本
第四节 国民经济的观念及其本质	第一节 资本运动的一般形式
第五章 经济学	第二节 剩余价值的源泉
第一节 学的观念	第四章 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二节 学的分类	第一节 劳动进程
第三节 经济学的定义	第二节 价值增殖进程
第四节 经济学的范围、职分及其分科	第三节 不变资本及可变资本
第五节 经济学原论的编次	第四节 剩余价值率
中卷	第五章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二编 经济史论	第一节 劳动时间延长
第三编 现世经济论	第二节 工资的低减

续表

《经济学原论》	《经济学大纲》上卷
下卷 第四编 经济理想论 第五编 经济运命论 第六编 经济政策论 第七编 补论	第六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一节 相对剩余价值的意义 第二节 简单的协作 第三节 分业 第四节 机器 第五节 相对工资的递减 第七章 资本的积蓄进程 第一节 简单的再生产 第二节 扩大的再生产 第三节 资本积蓄对于劳动力的需要的影响 第三篇 资本的流通进程 第八章 资本的变态及循环 第一节 货币资本的循环 第二节 生产资本的循环 第三节 商品资本的循环 第九章 资本的周转 第一节 固定资本及流动资本 第二节 工作期间及生产时间 第三节 流通时间及流通费用 第四节 景气的浮沉和资本的周转速度 第十章 资本周转和价值增殖的关系 第一节 周转时间(特别是流通时间)对于投资额的大小的影响 第二节 可变资本的周转时间对于剩余价值的年率的影响 第十一章 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第一节 简单的再生产 第二节 扩大的再生产 第三节 资本家的生产的尽头 第四篇 资本的总进程 第十二章 利润及利润率 第一节 剩余价值变形为利润 第二节 种种利润率变形为平均利润率 第三节 一般利率的下落倾向的法则 第十三章 商业资本及商业利润 第一节 商品交易资本 第二节 货币交易资本

续表

《经济学原论》	《经济学大纲》上卷
	第十四章 生利资本及利息 第一节 生利资本的运动形态 第二节 生利资本的物神崇拜性 第三节 利息率 第十五章 土地所有权及地租 第一节 超过利润变形为地租 第二节 等差地租 第三节 绝对地租 第十六章 金融资本 第一节 股份公司的勃兴 第二节 资本信用及银行 第三节 股份公司和资本集中 第四节 虚拟资本和创办人利益

资料来源：河上肇（1907，1929，1947）。

说明：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表中文字尽量使用原文词语。

《经济学原论》的序言极其简短，河上将学者手中的笔与武士的佩剑相比较，认为当时正处于日俄战争时期，是国家的多难之时，不能出征，就以笔代剑，以著作来回馈国家。这个立场显示出刚刚开始经济学研究的河上肇还是无法逃脱当时具有支配地位的官学立场（杉原四郎，1962）。

在随后的“著者例言”中，河上肇说明这本书所使用的概念还是基于《经济学上之根本观念》一书，但根据批评意见进行了修改。河上特别提到福田德三（1874—1930）对其的批评，并根据福田的建议，重新定义了“经济”与“经济行为”，以明确两者的不同。在书中，“经济行为”被定义为“为满足自身经济上的欲望的直接手段或者行为”（河上肇，1907：80），而“经济”则是遵循一定秩序的多数经济行为组成的一个整体（河上肇，1907：133）。

在进行了一系列概念的解析之后，河上肇列举了经济学的各个学科。其中第一门称为“经济学原论”（又称为经济学通论），明晰基本概念，提出各经济学科的共同问题。第二门称为“经济学特论”（又称为经济学各论），可以分为四大分科，八个小分科。四大分科分别为：国民经济学、国家经济学（财政学）、个人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每个大的分科又可以分为纯正与应用

两个小的分科，应用是指政策学而言。

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新手，河上肇在书里主要引用了前人的观点，其中在书中明确指出的就有大卫·休谟（David Hume）、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等人。但是，河上肇还是通过有选择的引用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对“经济学”的“学”这一概念进行辨析之后，他又特别引用了海因里希·迪策尔（Heinrich Dietzel）的观点，区分“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他指出：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纯理论，还必须寻求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根据理想社会的判别标准，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中，个人主义是指个人以独立的目的行事的原则，家庭、工会、国家等组织都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社会是按照个人意志建立和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社会有一个独立的意志，个人是实现社会意志的手段。迪策尔指出，这两个原则都不能通过实验来证实，而是取决于个人主观认定，并且社会不能被一个原则所支配（河上肇，1907：203—204）。这可能是河上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三田刚史，2003：73—74）。

可以说，河上从自身所关注的利己与利他的问题切入来理解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也展示出其早期的唯心史观。从后续的章节目录中，河上向读者展示了入世的解决之道，包括历史和现实中的经济状况，可能的经济发展方向以及终极目标，还有具体的经济对策。但其实困扰河上的问题并没有在写作中得到答案，反而引导他在完成《经济学原论》上卷之后，投入无我苑的宗教实践中，也暂时终止了包括经济学研究在内的所有世俗社会事务。

河上肇如此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1898年秋季到1902年夏季，我是东京帝国大学学生。在这个期间，我第一次阅读了《圣经》。《圣经》里宣传的那种绝对无我主义，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弦。从那以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问题，始终占据着我的心。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即1905年的12月，我抛弃了所有的职务，参加了当时提倡‘无我爱’的伊藤证信的无我苑，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几年来所存在的问题，而决不是灵机一动，突然想起这么做的。后来又隔了三年，到1908年秋季，我去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河上肇，1964b：419）

初到京都大学任职的河上肇还是沿用了在东京的讲义思路，即《经济学原论》的体系：

翻看一下我在1905年出版的《经济学原论》上卷的目次，第一章是

“经济上的欲望”，第二章是“财物”，第三章是“经济行为”，第四章是“经济”，第五章是“经济学”。这里面，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子都找不出。等到后来在京都帝国大学教书的时候，情形还是一样……翻看一下当时的讲稿，内中所介绍尽是奥国庞巴维克（Böhm van Bawerk）、美国陶西格（F. W. Taussig）、克拉克（J. B. Clark）、卡弗（T. N. Carver）、费希尔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几乎一点都没提到马克思的学说（河上肇，1964a：105—106）。

其实，即使到1913年出版的《经济原论》，还是没有反映出河上肇研究兴趣的变化，目录仍以古典经济学为主，但与《经济学原论》相比，新书更加倾向于马歇尔的体系。除第一章绪论之外，另外几章分别为：第二章，需求与价格；第三章，供给与价格；第四章，货币与一般物价。

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在日本逐渐深入，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河上肇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赴欧洲留学的经历也为其提出了解决社会贫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体现在《贫乏物语》一书中。在此意义上，河上肇提到的“科学”并非单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科学，而是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特别是日本知识界针对20世纪20年代所面临的“冬的时代”而做出的一种理论探索。河上肇是这些变化的亲历者之一。

哲学家三木清（1897—1945）这样回顾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我是在1920年大学毕业的，这一年将作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年而被铭记。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思想界出现了各种新现象。1918年底，东京大学成立了一个名为‘新人会’的团体。大概是在1919年出版了《改造》杂志的第一期，这个名字对当时的社会来说已经极具象征意义。也在1919年，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等人创立了《我等》杂志。吉野作造博士的活动主要围绕着《中央公论》展开，受到很多人关注。我也看到了这些杂志，感受到了巨大的社会变动。京都虽然仍相对平静，但以《贫乏物语》而闻名的河上肇博士也逐渐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大和田寛，2010）

在此之前，经济学领域的协会以金井延倡导的社会政策学会为代表，遵循德国历史学派的学术传统。正如前文所述，1919年，东京帝国大学与京都帝国大学先后成立了独立的经济学部，经济学专业从法科大学中分离出来。也在同一年，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成立。这些都标志着日本的经济学从之前

的国家学定位中脱离出来。

因此，河上肇从东京迁至京都的生活场所变化，也似乎在京都掀起了一个风潮，打破了古都的平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京都和京都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中心。

作为一个尽心尽责的教书匠，河上肇几乎每年都会更新讲义内容。这种教学内容的更新也给河上提供了反复思考的机会：

我本来一向要在准备讲义上费去很多时间，到了这时，才好容易有可能对《资本论》下些功夫；不过当然，我的讲义的内容，并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跳就跳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以动作缓慢为特征的我，那种变化，实在是十分缓慢的。试查看一下1923年到1924年的经济原论的讲义大纲（就像下文所说的那样，尽管1923年是我写“来不及拂去衣服上的征尘，又要开始新的旅行了”这首短歌年份，是抱定决心为了彻底弄通马克思主义而实行生命攸关的飞跃的那年），序论仍然是“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财政学”这两节组成的（换句话说，1905年出版的《经济学原论》第一篇序论的面目，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再看一看本论，第一篇是“生产论”，第二篇是“交换论”，第三篇是“分配论”，这个一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篇名取得完全相同；再看第一篇，是由第一章“生产和劳动”、第二章“劳动的社会化”、第三章“生产手段”、第四章“再生产”、第五章“生产力和社会组织”等五章组成，虽则到处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当大的影响，可是在根本构造上，却是和《资本论》里的研究方法、叙述方式完全不相干的。篇名和内容大体上变成《资本论》的解说的样子，还是从第二年的讲稿开始的。至于认识到非彻头彻尾用马克思的叙述改弦更张不可，因而下定决心把讲稿从篇名到内容（除了像财政资本那样的在马克思死后产生的东西而外）完全写成《资本论》的解说（当时大学内外正掀起排斥马克思的高潮，要不是真正有所认识，我也决不会那样做），则是又过了一年，即1927年9月到1928年3月的事（那份讲稿，后来用《经济学大纲》的名称，作为改造社的《经济学全集》第一卷出版）（河上肇，1964a：107—108）。

从三个学期的讲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河上肇从资本主义经济学到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的框架设计变化（见表 4）。1921—1922 年的讲义还是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展开，例如国富、效用论等；而到 1923—1924 年，讲义虽仍为古典学派风格，但更加偏向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结构特点，包括生产、消费和劳动等基本概念与供需等基本法则，还有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内容；在辞职前的 1927—1928 年讲义中，虽仍夹杂边际效用论等内容，但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恐慌、资本等主题，河上已经开始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了。

表 4 河上肇“经济学原论”讲义

1921—1922 年		1923—1924 年	1927—1928 年
第1篇	生产原论	绪论	绪论
第1章	经济学及富	第1篇 生产	第1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1篇	生产论	第1章 生产与劳动	第1章 商品与商品价值
第2章	生产及劳动	第2章 劳动的社会化	第3章 边际效用论
第3章	协作及分工	第3章 生产手段	第2部 社会主义经济学
第4章	工具及机械	第4章 再生产	第2篇 科学社会主义
第5章	生产力及社会组织	第5章 生产力与社会组织	第1章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第2篇	交换原论	第2篇 交换	价值形态、货币
第7章	需求供给的法则	第6章 价值的实体与表现	第5章 转化为货币
第8章	对享乐财的需求	第7章 价值形态的发展与货币	第8章 劳动生产力的 发展
补讲	“效用”的意义	第8章 需求供给法则	第3章 工具与机械
第9章	对生产财的需求	第9章 生产成本与价格	第4章 恐慌与消费不足
第3篇	货币原论	第10章 需求与生产力的分配	第8章 资本的变形 (Metamorphose)
第11章	货币的性质与作用	第11章 价值与价格的背离	第2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12章	作为资本的货币	第3篇 分配论	第2节 商业交易利润 (Kommerzieller Profit)
第13章	货币制度	第12章 个人所得与社会所得	第3节 一般利润率下降 趋势法则
第14章	信用的性质与功能	第13章 劳动收入	股份公司
第15章	竞争的剩余价格	第18章 股票红利与创业得利	垄断
第3章	关于劳动价格的 学说	第14章 产业资本与产业利润	
第4章	收入的概念及其 种类	第15章 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	
第4章	关于利息的学说	第16章 资本金与利息	
第2章	收益递减法则		

资料来源：河上肇文庫講義ノート・原稿・手稿類，<http://www.econ.kyoto-u.ac.jp/~chousa/collection.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6 月 13 日。

说明：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表中文字尽量使用原文词语。

河上肇的思想轨迹也在讲义中显示出来。他每个学期的讲义都有随时更改的痕迹，篇章安排也有重复。这种更改到最后一个学期的讲义时更为明显。最后一讲的时间为1928年2月8日，因为在新学期的4月17日，河上肇就接到了辞职要求，讲义的内容就终止到股份公司和垄断这一部分了。这也与后来出版的《经济学大纲》的内容相符。

最后一讲的资料附有藤本银行的谷村一太郎（1871—1936）的文章《产业的基础在民众：参与企业的方法发生了变化》。这篇文章以连载的形式分四次发表于《大阪每日新闻》（1926年2月2日—2月5日）。河上收集了所有的四篇文章，按顺序粘贴在自己的黑色讲义本中。其中多处用红笔标出，并且在旁边附加了文章的出处，以及“本质与现象的矛盾”等铅笔批注。这一批注针对的是下面这段论述：“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尼克松·卡弗在其近著《美国当今的经济革命》（Carver, 1925）一书中，描述了美国产业中枢从少数富人转移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手中的情况，并称这是一种可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媲美的经济革命现象。”在文章之后，河上的评论为“大多数股东仅仅是为了获得分红”，对谷村的结论并不以为然。

河上肇还专门引用上田贞次郎（1879—1940）《股份公司对于现代经济生活所加的影响》中的片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法律上说，股份公司的经营的最高机关，就是股东大会。但是，谁也知道，股东大会是极无力量的东西。在股东大会里面讨议营业的方针，那种事儿几乎没有。不但没有，并且连股东大会也决不是一种在实际上聚集了股东的集会。实在只是聚集了股东的委任状的会议。并且，那还并不是所有股东把他所特别信任的人委任为代理人。在事实上只要把印在来回明信片的空白委任状集合起来，就算开成股东大会了。在那里，只不过极少数的人集合起来，在十五分钟至三十分钟之间，做一些形式的报告，弄一些决议，就算股东大会终结了。”（河上肇，1949：537—538）

以上引用的这些资料都在《经济学大纲》书中出现了。在书中，河上肇除了引用谷村文章的第一段之外，还列举了谷村文中的银行存款、保险合同数量与平均金额、主要行业股东人数与平均认缴股金等数据。最后，河上给出了否定意见，认为即使有这样的金融数据，还是不能认为一切民众都能够参与企业经营了（河上肇，1949：540—544）。

除此之外，讲义中还引用了松崎寿《工业金融论》中关于柏林地铁和股

份公司的说明，来解释创业者获得股票发行利润的机制。在书中，河上肇利用一个马克思理论框架下的示意图（见图 1）做出了形象的说明（河上肇，1949：524—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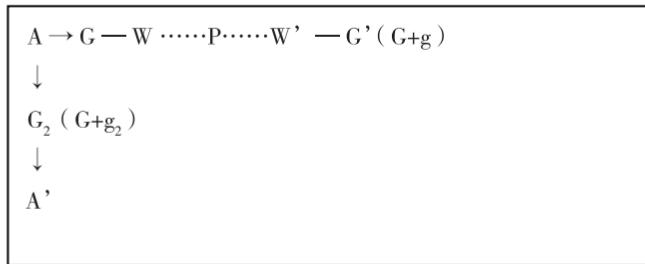


图 1 河上肇关于创业者利润的示意图

资料来源：河上肇（1949：525）。

图 1 中 A 到 A' 为股票市场活动，代表虚拟资本的流通， $g_2$  为创业者发行利润；而 G 到 G' 为资本循环过程，其中 G 到 W 为商品市场，W 到 P 为生产过程，W' 到 G' 为商品市场， $g$  为红利。河上肇增加的因素就是根据股票发行机制引入的创业者角色、红利变量和二级市场流通机制，这更加符合其所处时代的资本市场特征。

讲义中还有关于垄断的讲解，标明是在 1926 年 2 月 13 日讲完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银行如何通过集中资本来获得垄断能力的。但这几页都用红叉去掉了，也未在最终的书中出现，看来这份 1928 年 2 月 8 日的最终讲义也是有所删改的。

周到的河上老师在教科书后还附上了一份参考书目录，并详细说明了文献的主要内容与使用方法。其中，《资本论》列在首位，另外还包括河上自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另外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日文译本，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日文译本，普列汉诺夫（1856—1918）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日文译本，以及当时日本学者的相关著作和报纸杂志的文章等，目的就在于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资本论》（河上肇，1947：441—445）。

河上肇在《经济学大纲》的序言中这样解释自己的“经济学原论”讲义：“本书‘资本家社会的解剖’，是我由一九二七年四月起至一九二八年三月止，

一学年间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讲授了的经济原论的讲义稿本。我在这个大学任职约二十个年头，每年都把讲义稿本改写一次，成了习惯，即令内容上毫无变化的部分，我也得改写一遍，因为，如果稿本上的墨水不新鲜，我就不能够提起精神讲授。不过，到最近内容上可以改变的地方非常减少了，所以我正暗暗的忧虑着，难道以后每年都要忍着痛苦，去宣读大略同样的讲义吗？正在这时候，我被当局给了辞职的机会。我欢喜的抓住这个机会，由大学的研究室，退到自宅的书斋了。这样一来，我倒免得年年反复改订同一个题目的稿本的义务了。”（河上肇，1949：“序”1）

在此后的自传中，河上肇对讲义内容有了更明确的定位：“恰巧就在讲完这门课程的第二个月，我就不得不离开大学了；这也就是说，我的经济原论的讲义，从当时一般大学里所通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每年有所改变，最后写成了任何大学里都找不出的彻头彻尾的《资本论》解说……”（河上肇，1964a：108）

实际上，《经济学大纲》是分上下两卷的，上卷即河上肇所言“资本家社会的解剖”，以《资本论》的解读为主（参见表3），而下卷则是重印了之前出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一书，河上将题目修改为“资本家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这样安排，河上肇认为这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到无产阶级经济学的演进，两者有承接关系，放在一起才可以称得上是完整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1947：“序”9）。

河上肇在自传和书的前言里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直到今春为止，在那儿〔京都大学〕工作了几乎二十年。我在那里所研究的，现在回想起来，在经济思想史方面，在最初约十年间，主要仍旧是往年的老问题——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关系问题。正因为这样，我的旧作《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一开头才从孟第维尔肯定利己思想的主张写起，最后以纳斯钦的否定这种思想的主张终篇。这本书与其说是经济学史，不如说是反映在经济学领域内的道德思想的历史。不管好坏，我觉得它总形成着一个完整的系统（河上肇，1964b：419）。

我是在五十岁前后，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完成了从最初出发点——地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到它的对立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完全转化，在哲学的领域里完成了从掩盖着一层宗教的神秘云雾的最初出发点——唯心论

到它的对立物——彻底唯物论的完全转化的（河上肇，1964a：126）。

这个稿本〔《经济学大纲》〕虽然成为经济原论的讲义，但是，只要看一看，谁也知道，在实质上，几乎是和马克思“资本论”的解释一样的东西。也许有一些人觉得奇怪，却是由我看来，因为马克思“资本论”是顶好的经济原论，所以我在自己去讲授经济原论这个课目的时候，就不能不全然依据“资本论”。也许还有人说，虽然如此，不会太过于偏向马克思吗？却是，据我的意见说来，真理不会有两个的，所以，如果马克思的学说抓住了真理，我们除了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他所建设的基础之上，别无办法（河上肇，1949：“序”2）。

综上，从宗教真理出发的河上肇至此到达了科学真理的彼岸。他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具体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分析，并指明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路径。为此，河上肇最为关注的是唯物史观。另外，宗教信仰为河上肇设定了根治贫困的社会目标。因此，宗教真理与科学真理为河上肇赋予了一个社会改良的立场（深澤竜人，2019）。正如河上肇最爱引用的出自《论语·颜渊》的一句中国古语所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 四、结语

我国学者对于河上肇的关注，主要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解读，这种关注自民国开始延续至今日。民国时期，日本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三大来源之一，对中国思想界具有直接（河上肇的中国学生）或者间接（河上肇的译著）的影响。对于今天的学界来说，河上肇就不仅仅具有传播者的意义了，而是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从其自身的思想历程来解析日本近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萌生与演变。河上肇讲义就提供了追踪这一思想历程的一手资料来源。

河上肇前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思想转向，第一次是从历史学派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第二次则是在出狱之后停止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他的转向与日本思想史的时代风潮契合，而他所坚守的，就是热切地拥抱思想的潮流，并以学者的钻研精神去深入理解思想的内涵，来解答自己的人生困惑。

在这个意义上，他在京都大学任教的二十年时间，也正是教学相长，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对于河上肇来说，宗教信仰给他提出了问题，就是“为什么社会中存在贫困”。在经济学领域，他最终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以此作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科学真理。他在这两次转向过程中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对民众有启迪作用。因此，河上肇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全面地、系统地介绍到日本及其他国家，还有基于其个人经历，通过学习与研究来达成信仰的路径。

在拥抱社会风潮的同时，河上肇也作为思想史链条的一环为东亚经济思想史的变迁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实例。正如导论中所综述的那样，河上肇的意义更多地体现于中日韩等东亚国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其人生的高光时刻，但这一时刻前有德川国家学、宗教信仰和历史学派的铺垫，后有迫于压力而放弃信仰的转向作为对照。这一人生轨迹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与国家的选择相对应。这就提示我们在考察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制度选择时需要关注本土因素及差异化特征，在追寻西学东来的路径时需要添加东亚区域内的内生影响因素，并体会东亚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思想包容性，以及与时俱进的特征。

### 参考文献：

- 安雅琴，2016，《陈溥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关系考——基于唯物史观的相关论述》，《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
- 程恩富主编，张忠任著，2006，《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日本卷》，东方出版中心。
- 韩一德、李帆，1992，《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略论李大钊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
- 河上肇，1929，《经济学大纲》，陈豹隐译，乐群书店。
- 河上肇，1949，《经济学大纲》，陈豹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河上肇，1964a，《河上肇自传》（上），储元熹译，商务印书馆。
- 河上肇，1964b，《河上肇自传》（下），储元熹译，商务印书馆。
- 贾纯，1992，《河上肇的哲学“征程”与贡献》，载《外国哲学》编委会编《外国哲学》第11辑，商务印书馆。
- 李斌，2017，《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文学评论》第6期。
- 李虹，2013，《河上肇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 莫里斯-铃木，泰萨，2000，《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商务印书馆。

- 孙怀仁、雍文远主编，1994，《经济大辞典·政治经济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 谈敏，2016，《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中），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杨栋梁，2022，《二战前后日本社会的思想“转向”——“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转向〉述论》，中国日本史学会年会论文，天津。
- 虞丹，2001，《聚沙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 宗山，1991，《河上肇评传》，载燕宏远编《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 大和田寛，2010，「1920年代におけるマルクス主義の受容と社会科学文献」『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第3期。
- 河上肇，1905，『経済学上之根本観念』昌平堂川岡書店。
- 河上肇，1907，『経済学原論』有斐閣。
- 河上肇，1947，『経済学大綱』改造社。
- 加藤周一，井上ひさし，杉原四郎，一海知義，2000，『河上肇：21世紀に生きる思想』か もがわ出版。
- 京都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1997，『京都大学百年史』京都大学。
- 京都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2001，『京都大学年表』京都大学。
- 三田剛史，2003，『甦る河上肇——近代中国の知の源泉』藤原書店。
- 杉原四郎，1962，「河上肇と古典派経済学：「近世経済思想史論」を中心として」『關西大學經濟論集』第1号。
- 深澤竜人，2019，「河上肇のマルクス経済学への転身に関して——日本マルクス経済学史Ⅱ』『経営情報学論集』第25号。
- 細川元雄，1979，「京都大学時代の河上肇」『經濟論叢』第5—6号。
- 一海知義，1979，「漢詩人河上肇の旧蔵書－京大河上文庫訪書記」『經濟論叢』第5—6号。
- 박종린，2009，「1920년대 전반 사회주의사상의 수용과 맑스주의 원전 번역 — 「임금 노동과자본」을 중심으로—」『한국근현대사연구』년제51집。
- 박종린，2012，「1920년대 사회주의사상의 수용과 맑스주의 원전 번역 — 「임금·가격·이 윤」을 중심으로」『한국사상사학』년제42집。
- 박종린，2014，「1920년대 사회주의사상의 수용과 맑스주의 원전 번역 — 「유토피아에서 과학으로의 사회주의의 발전」을 중심으로—」『한국근현대사연구』년제69집。
- Bernstein, Gail Lee. 1976. *Japanese Marxist: A Portrait of Kawakami Hajime, 1879 – 1946.* Cambridge/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rver, Thomas Nixon. 1925. *The Present Economic R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 On Archive of Kawakami Hajime: Conversions from the Historical School to Marxism

*Liu Qunyi<sup>a</sup> and Xiang Zeyu<sup>b</sup>*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sup>ab</sup>)

**Abstract:** As a key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economic thought in East Asia, the importance of Kawakami Hajime can never be overemphasiz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Kawakami's archives from Kyoto University to catch up with his intellectual journey, i. e. , the conversion from the historical school to a Marxist, and thereby to se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Zeitgeist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Based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statecraft thought, Kawakami questioned social issues through religious beliefs and integrated the two in the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school, and then turned to Marxism in his practice of teaching and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ultimately choosing scientific socialism. Tracing this intellectual journey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Kawakami's second conversion, both of which manifest, his attention to and following of Zeitgeis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e that followed.

**Keywords:** Kawakami Hajime, Historical School, Marxism,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JEL Classification:** B24, B31, O53

(责任编辑：王姣娜)